

王瑞妮,高 敏. 促进秦东地区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路径分析——基于陕西省渭南市的调查[J]. 江苏农业科学,2013,41(10):425-428.

促进秦东地区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路径分析 ——基于陕西省渭南市的调查

王瑞妮,高 敏

(渭南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渭南 714000)

摘要:针对秦东地区失地农民社会融合中遇到的障碍,分别从经济和社会 2 个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就业能力等 5 点建议,以促进失地农民社会融合,以便能从根本上综合解决失地农民所面临的多种问题。

关键词:秦东地区;失地农民;社会融合;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 C913.7;F3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3)10-0425-03

20 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便开始了城市化进程,一些农民因此被强制征收土地以支持城市化建设。但这些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并未完全转化为市民,更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一些人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新社会弱势群体,引发了整个社会对他们失去土地后的生活与发展的关注。

秦东地区处于陕西关中渭河平原东部,东频黄河,南倚秦岭,总面积约 130 万 hm^2 ,人口 561 万。该地区素以农业发达著称,可耕地占总面积的 96%,号称“陕西粮仓”。秦东地区现有农业人口 439 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78%。可以看出,农业在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速推进,渭南市以城区为中心向城区以北、以西迅速扩张。2003 年,渭南市在主城区临渭区以北设立渭南经济技术开发区,从 2004 年开始实施建设,同时在建设渭南北站的过程中征用了大量农民土地,渭南的失地农民在逐年增加。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仅 2010—2012 年渭南市就出现失地农民共 51.4 万人。

对于以农业为主导的秦东地区,研究其失地农民问题十分必要且有重要意义。首先,秦东地区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因此失地农民的数量还会不断上升,他们将成为秦东地区各种社会群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其次,秦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面面临一系列如就业、社会保障、心理适应、角色转变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对秦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最后,想要依靠秦东地区本身经济的发展、以市场机制为手段解决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有必要对秦东地区失地农民问题在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视角以根本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本研究在对渭南市 140 位失地农民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以社会融合为目

标,深入探讨失地农民社会融合过程中遇到的障碍,以政府为主导构建促进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政策框架,全面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为根本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及促进秦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1 社会融合理论

社会融合是 Durkheim 在对自杀现象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认为它是导致自杀的社会原因^[1]。之后,学者们沿着实证研究的线路对它进行了发展。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断涌现新的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发展失衡等,只针对单一问题提出的政策已不能解决交织在一起的各种问题,构建和维护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成为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政策构建者和分析者越来越感知到应该整合一个概念来应对更大范围的挑战^[2]。于是社会融合概念受到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策制定者的青睐,成为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政策诉求及社会健康发展的手段和目标。当代西方社会政策研究的焦点之一就是基于社会融合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应用,其研究集中在 2 个领域: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社会融合的现状、影响因素、形成机制或社会后果,将社会融合看作是一种状态或过程;政策研究主要将社会融合作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政策工具,或者直接将它设定为社会发展的目标,该研究不仅把社会融合作为一种状态或过程,更是把它当成手段与目标。

目前,社会融合还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2003 年欧盟在关于《社会融合联合报告》中对社会融合的界定是这样的:社会融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确保具有风险和社会排斥的群体能够获得必要的机会和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和机会,他们可以全面参与和享受正常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享有他们居住的社会具有的正常社会福利^[3]。加拿大莱德劳基金会(the Laidlaw Foundation)认为,社会融合旨在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参与一个值得重视、尊敬和奉献的社会。虽然社会融合概念目前还存在较大争议,但它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第一,融合是一个对现状不断挑战的动态过程;第二,社会融合既是目的,同时也是手段;第三,社会融合是非强制性的,它不仅是制度性的,同时也是主观性的,没有人可以通过强制力量

收稿日期:2013-07-30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编号:201210723008);

陕西省渭南市人口与家庭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编号:13RKWT01、13RKYB04)。

作者简介:王瑞妮(1982—),女,陕西礼泉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三农”政策。E-mail:42363677@qq.com。

达到社会融合;第四,社会融合是多维度的,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和心理;第五,社会融合是多层面的,涉及宏观、中观、微观 3 个层面的融合;第六,社会融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包括适应环境和被环境接受和认可 2 个方面。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社会融合界定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能够充分参与和平等地享受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能够获得公平的权利和机会,彼此之间相互适应、相互认同。

2 秦东地区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障碍

2.1 经济方面的障碍

2.1.1 征地制度不完善导致失地农民权益受损 第一,农民土地产权界定不清。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了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对于土地的产权在《土地管理法》中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但实际上,土地的集体产权是虚置的,农民个体并不能真正享有所有权带来的权益。首先,“集体所有”中的“集体”范围不清,包括乡、村、组 3 级集体组织,这就造成在分享征地补偿时,这 3 级集体组织都可能参与;其次,集体所有使每个人的退出权被剥夺,意味着只有农民在这个集体中才能享有“集体中的一份土地的所有权”,如果退出集体组织,则不享有土地所有权。这种集体所有权的规定,事实上使得农民和集体在权益关系上是模糊的,再加上在农民的认识里,土地就是国家的,国家有权利收回土地。法律与认识的双重误区,造成在政府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权益受损严重。

第二,征地补偿标准不科学。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并不能体现真正的土地价值。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补偿费的标准是以被征耕地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倍数来计算,因此它只包含了土地直接损失而没有包括间接损失,而间接损失是可能高于直接损失的。征地补偿应该是对农民永久性失去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补偿,及购买土地产权的补偿。以耕地前 3 年平均年产值的倍数来计算土地产权的价格,显然没有充分依据。同时,征地补偿费与土地被征后的市场拍卖价格两者相差甚远,这说明土地增值收益并没有被土地法律上的产权所有者“农民”所享有,农民合法权益在征地补偿中严重受损。通过对渭南市部分失地农民调研了解到,2010 年渭南市征地补偿的标准是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总共是 47.5 万元/hm²。根据渭南市国土资源局 2008 年 12 月公布的《渭南市城区土地征收征用实施意见》[渭政办发(2008)202 号]的规定,渭南沔河以西华山大街至汉马街区域、乐天大街以北至渭河南岸以及渭清路以西区域,征地补偿标准确定为 97.5 万元/hm²。而我们所调研的地区正好处于这一区域,这说明原本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在执行时没有完全向农民兑现,使被征地农民权益受损。

第三,安置方式单一。目前,各地对于失地农民普遍采用一次性货币安置方式,这种方式被农民俗称“一脚踢”,即失地农民在一次性全额货币安置补助后,自己择业,自行解决养老医疗等问题。货币安置的缺点是十分明显的:第一,货币安置缺乏持续性,不利于失地农民后期生活的可持续发展;第

二,部分失地农民对于补偿缺乏长期合理规划,短期内肆意挥霍使其迅速返贫;第三,瞬间财富急剧增加,导致部分失地农民产生享乐、奢侈的生活作风,丧失重新就业的动力,部分失地农民将大量的闲暇时间用在看电视(47.9%)、打麻将(14.3%)和聊天(31.1%)上;第四,相比于固定资产的保值增值来说,货币一旦不用于投资就会一直贬值,而失地农民缺乏资本投资的相关专业知识和风险承担能力,大部分村民会将补偿款存入银行,任其不断贬值,使其拥有的财富不断缩水;第五,当失地农民手中补偿资金用完时,他们可能会选择极端方式来表达诉求从而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威胁社会稳定。

2.1.2 城市生活成本高 城市生活的成本相对于农村生活要高很多,其中增加的主要项目有:食品、交通、住房、物业、水电等。在访谈中,一位失地农民粗略计算了一下他被征地前后生活成本的变化:征地前,吃的粮食、蔬菜是不用钱的;征地后这两项他们一家三口每月需要增加支出六百元左右,每月增加物业管理费、水电费、交通费合计约两百元,每年要交暖气费一千元左右。这些是失地农民在征地后净增加的生活成本。伴随生活方式的转变,可能还会临时增加其他的各项费用,对失地农民来说这将是一笔重要支出。通过调研发现,失地农民在进入城市后,家庭支出主要是日常生活支出和孩子教育支出,选择旅游、教育培训和社会交往的只占 4.3%。

2.1.3 城市重新就业难 根据国家统计局渭南调查队对临渭、合阳、富平、白水、大荔、蒲城、澄城 7 个县(区)8 个乡镇办 7 个行政村的征地农民生活状况进行的调查,其中自谋职业和外出打工的有 2 083 人,占 44%;在县城打零工的有 1 467 人,占 31%;没有找到谋生职业的大约有 1 183 人占 25%,特别是 40 岁以上年龄偏大的劳动力中,40% 的人员没有找到工作^[4]。失地农民进入城市难以就业有两方面因素: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从自身因素来说:第一,失地农民自身素质偏低,适应社会能力差,由于长期从事重复性简单劳动,失地农民离开土地后缺乏重新就业技能,加上失地农民多数文化素质水平偏低,学习新事物较慢,适应社会能力差;第二,收集处理信息能力弱,相较于农村稳定、不易多变的环境,进入城市后,面对各种海量信息,失地农民面临如何收集信息以及如何使用信息两个问题;第三,竞争观念淡薄。从外部因素来说:第一,城市吸纳失地农民能力有限,当大批失地农民突然涌向城市时,城市由于其自身原有体系的正常运转而无法立刻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只可能满足一部分就业需求;第二,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有相当多的失地农民从没接触过就业指导与培训并且缺乏失地农民就业保障金的有力保障^[5]。

2.1.4 社会保障水平低且不完善 根据渭南市土地资源管理政策,一个村人均耕地 0.02 hm² 以下即为失地农民。渭南市调查队对临渭、合阳、富平、白水、大荔、蒲城以及澄城等 7 个县(区)的调查显示:7 个县征用土地面积 3 598.9 hm²,涉及 3 591 个农户,共有人口 12 386 人。这 7 个行政村中享受农村低保人数为 297 人,其中 6 个村低保人员每月领取金额 60 元,占调查村的 85.7%。60 岁以上老人中,享受国家特困救济的有 104 人,享受村集体救济的有 50 人,月领 100 ~ 120 元。目前,这部分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主要靠家中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或在县城打零工,根本无法承担看病、子女上学、修房造屋等家庭大额支出,特别是失地农民丧失劳动力后,晚

年生活比较困难。据调查,60 岁以上老人(1 445 人)中生活处于温饱线下的大约有 480 人,占 33.2%;处于特困状态靠民政救济的有 104 人,占 7.1%;近 50 人靠在街上捡破烂勉强维持生活,占 3.4%^[4]。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政府能够为失地农民提供的社会保障仅有最低点生活保障和养老、失业、医疗、住房等保障是缺失的,而且水平很低,难以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

2.2 社会方面的障碍

2.2.1 身份认同模糊 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是其社会融合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简单地说,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是指人们对其社会身份的认同^[6]。当社会个体成为某个群体中的一员,才能以某种身份进入社会生活,获得社会归属感和价值感,这种由群体成员身份而来的归属感和价值感是每一个人自我概念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却存在明显障碍。我们的调查显示: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22.7%的人认为自己是市民,36.1%的人认为不是,41.2%的人说不清楚。究其原因,长期的二元户籍制度是造成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主要原因;其次,社会保障缺失使失地农民明显感受到和市民的差异;最后,征地过程中农民合法权益的损失和失地后农民的生活境遇,使失地农民产生强烈的不公平和排斥感。

2.2.2 新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困难 一方面,我国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是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构建的,农民失去土地后,原本的生活和交往圈被打破。而城市社区更多以业缘关系为纽带建立社会关系网络,缺乏稳定就业关系甚至处于失业状态的失地农民受传统认知观念和生活方式影响,在陌生的城市环境中要重构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受到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城乡社会发展差异巨大,城市和农村在很多方面是隔离的。这就造成市民和农民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思想认识等方面存在巨大分歧,形成了市民与农民之间的相互排斥,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与市民建立良好社交关系的难度。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到,失地农民在选择经常交往的人方面,18.5%选择亲戚,31.9%选择原村村民,26.7%选择同事,13.4%选择现在社区的居民。这说明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的人际关系网络变化不大,重构新的社会关系存在困难。

2.2.3 生活方式转变难 首先,两种生活方式差异大。相比较而言,农村生活节奏慢,生活自主性强,较安逸且自由随意;而城市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公私域区分明显,要求遵守公共秩序与规则。两种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导致失地农民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其次,居住方式的改变增加了心理适应难度。失地农民从以前的邻里之间十分熟悉融洽的村落居住环境搬进相互陌生、封闭的高楼大厦,造成失地农民心理上的隔绝、孤单,使其更难以适应城市生活。

3 促进失地农民社会融合的路径

3.1 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

3.1.1 建立清晰完整的物权制度 只有建立清晰完整的土地物权制度,才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首先,清楚界定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产权主体。其次,完善农地产权权益。在我国,农民享有的

土地使用权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权益,比如农民不享有土地增值收益即土地发展权,因此应明确界定、完善与土地使用权相关的一切权利,如处置权、收益权、占有权、经营权等当属于农民,并且通过严格执法来切实保障农民真正享有这些权益。

3.1.2 科学合理制定征地补偿标准 目前失地农民补偿费以及安置补助费存在的一个巨大的不公就是忽视土地转变用途后的巨大增值收益。政府不能以土地的传统用途即耕种为标准来补偿农民,应该充分考虑土地转变用途后的市场价值,以此为基准在考虑失地农民长期损失和无形损失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确定征地补偿标准^[7]。另外,应探索出更合理的补偿方式,比如土地增值价值分享机制,通过参股方式,让失地农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3.1.3 创新征地补偿分配方式,使其具有可持续性 针对失地农民安置方式单一且存在短期性的问题,政府应当创新征地补偿方式,变一次性补偿为长期受益。政府应该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分享机制,使失地农民可以长期从失去的土地中得到收益。若所征收土地被用于发展不具强制性的工商业,政府应当允许失地农民以土地使用权入股或出租的方式参与土地开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8]。

3.2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面对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有限的货币安置费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就是“让失地农民有尊严地活着”的最后一道防线。马太效应启示我们,若不对城市中新的弱势群体给予一定帮助,那么失地农民会越来越穷,直至成为这个社会的边缘群体^[7]。

对于失地农民所处的尴尬境地来说,政府在失地农民失去土地的保障功能后,应该为其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子女教育保障。养老保障是维持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必要前提,应该建立“分年龄、广覆盖、低水平、多层次”的保险模式^[9]。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要在借鉴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全新的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子女教育保障主要通过 3 个方面来实施:第一,对失地农民子女开放义务教育资源,允许其在安置地附近接受义务教育,享受同其他市民子女同样的待遇;第二,为失地农民子女建立定向教育基金,教育基金部分来源于土地赔偿费,另外地方财政予以补贴,该基金主要用于失地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时的部分学费支出;第三,建立失地农民子女心理援助机制,免费为失地农民子女在适应城市生活过程中提供心理援助。

3.3 提升失地农民就业能力,拓宽就业渠道

第一,应积极开展各种职业技能培训,有针对性地安排不同训练内容,尽可能发挥他们的个人优势;第二,构建全面的失地农民就业网络,通过电视、广播、网络、人力资源中介组织等为失地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服务,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第三,应结合市场需求,选择一些技术易掌握、市场发展空间大,预期收益良好的创业项目,并为他们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和技术指导,帮助失地农民进行创业;第四,展开相关的心理干预,有报道称,一部分失地农民拿到征地补偿款后缺乏就业意向,又难以适应生活环境和方式的转变,人际交往缺乏,终日无所事事,甚至打牌赌博,有些家庭因此致贫,因此,

郭 洁,樊相宇. 基于 SUMT 的加工番茄种植规划[J]. 江苏农业科学,2013,41(10):428-430.

基于 SUMT 的加工番茄种植规划

郭 洁,樊相宇

(西安邮电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针对加工番茄产量与番茄酱厂产能之间的匹配问题,在建立加工番茄产量模型的基础上,根据番茄酱厂产能,基于 SUMT 求解加工番茄最优种植方案,规划加工番茄的种植品种、种植时间、种植面积,从而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番茄加工企业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SUMT;加工番茄;种植方案;惩罚函数法

中图分类号:F325.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3)10-0428-03

加工番茄 (processing tomato) 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特色果蔬产业^[1-3]。现阶段新疆番茄产业存在问题:整个生产期内番茄酱加工厂的生产能力是固定的,而番茄产量却呈现早期和晚期产量不足、中期产量过剩的状态,导致番茄酱加工厂早期、晚期“吃不饱”,中期“吃不了”,造成原料浪费,降低了生产效益^[4-7]。加工番茄产量与番茄酱加工厂产能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加工番茄种植面积、种植时间以及种植品种的重要依据。单纯形法、拉格朗日乘子法、惩罚函数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小麦、玉米、大豆、水稻等作物的种植决策中。加工番

茄的种植与加工是以日产量与产能相匹配为目标的微观规划和预测问题,属于多个约束条件下的非线性多变量问题。目前国内对番茄种植规划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大都采用线性规划方法(如单纯形法),即使采用了拉格朗日乘子法等非线性规划方法,也存在优化结果不够精确等问题^[8-9]。为了使研究结果准确有效,建立非线性多变量模型已成为必然^[10-12]。本研究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番茄酱加工厂及其周边番茄种植情况为例,将惩罚函数法应用于番茄种植规划,解决多个约束条件下的非线性多变量问题,从而得出最优种植方案,确定合理的加工番茄种植品种、种植面积、种植时间,旨在为加工番茄种植规划提供指导。

收稿日期:2013-06-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61064005)。

作者简介:郭 洁(1988—),女,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项目管理研究。E-mail:415050962@qq.com。

通信作者:樊相宇,硕士,教授,主要从事系统工程研究。E-mail:fxu@xupt.edu.cn。

应该对这类失地农民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和辅导,帮助他们在心理上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3.4 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消除社会排斥与歧视心理

失地农民在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中已遭遇不公,若在精神上再遭受歧视,这对他们来说就更是雪上加霜,有可能将其推向崩溃的边缘。因此,首先应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和引导,消除社会对失地农民的偏见与歧视,引导市民主动接纳和帮助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生活;其次,建立心理援助机构,对失地农民心理进行关注与引导,消除失地农民对市民的排斥和自我封闭心理;再次,在城市社区中构建融合、互助、团结的文化氛围,为失地农民融入城市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3.5 丰富社区文化交流

法国社会学家 F·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中指出,社区是生活共同体,以地域、意识、行为以及利益为特征。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社区中的居民通过在一定地域中生活与交往,会形成相似的观念、文化、行为方式、心理、意识等。社区生活是失地农民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心理意识等方面转变的重要途径。丰富社区文化交流,目的就在于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娱乐活动,消除市民与失地农民之间的距离与隔阂,使失地农民形成与市民相似的观念、心理与行为,从而使失地农

1 问题描述和模型建立

1.1 问题描述

现阶段的加工番茄产量、番茄酱加工厂产能呈现不平衡

民从内心接受城市生活,最终达到与城市社会融合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Durkheim E. Suicide[M]. London: Routledge, 1951: 202.
- [2] Beauvais C, Jenson J. Social cohesion: updating the state of the research[R/OL]. [2013-06-10]. http://www.cprn.org/documents/12949_en.pdf.
- [3] 嘎日达, 黄匡时. 西方社会融合概念探析及其启发[J]. 理论视野, 2008(1): 47-49.
- [4] 门世功, 闵改明. 渭南市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情况调查与思考[J/OL]. [2013-06-10]. <http://www.weinan.gov.cn/wzwn/wnj/2011n/dsyj/dcxj/195345.htm>.
- [5] 李雅静. 失地农民就业难的因素分析[J]. 新西部: 下旬刊, 2011(3): 13-14.
- [6] 许振兴. 二元户籍制度与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基于大学生社会实践调查[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 38(27): 15370-15372.
- [7] 屈晓娟. 社会排斥视角下的失地农民与城市融合问题研究[J]. 陕西农业科学, 2011, 57(2): 214-216.
- [8] 阮志刚.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的思考和对策[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6(2): 24-25.
- [9] 张红艳.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D]. 太原: 山西大学, 2008: 38-39.